

代理難題及典則理論的評估： 維和行動的文獻回顧*

游智偉

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目的在於透過回顧以維和行動為客體的研究，呈現相關研究在國際組織研究及新自由主義架構下的貢獻與不足之處。第一，代理難題仍是相關研究最常用以檢視這類議題的架構，源於分工不明與利益衝突的代理難題是最常出現的現象，同時也是這類研究偏好的議題。第二，資訊失衡造成的代理難題雖可能對維和行動的效力產生最大的負面影響，但卻較少被研究。第三，相關研究與實踐侵蝕了典則理論的主張如下：其一，非民主國家在重複賽局的架構下並未改變其對維和行動的觀點，這樣的現象挑戰了典則理論對聲譽及議題聯結的主張。其二，聯合國對部隊紀律的不作為侵蝕了獎懲機制的前提，暗示著聯合國對人道干預與人權價值的尊重不

* 本文初稿發表於2018年國際關係學會年度研討會，初稿標題為「維和行動的文獻回顧：國際社會的動機與成效」，作者感謝評論人莫大華教授的悉心評論。同時，作者也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及編委會豐富且具高度的建議，這些建議均使本文的內容更豐富、論證更完整。作者最後並感謝科技部的協助，本文為科技部計畫「中共與維和行動：政經利益的衡量與選擇性的貢獻」（MOST 106-2410-H-015-007-）的部分研究成果。而若本文有任何錯誤、不足或應進一步改進之處，均為作者個人之責。

足。第三，聯合國對民主和平的期待與對民主化的支持，造成聯合國與地主國之間的資訊失衡，反而帶來更多的困難與挑戰。

關鍵詞：維和行動、代理難題、典則理論、人道干預

* * *

壹、前言

聯合國記取國際聯盟的教訓，成立維和部隊，但衝突形態在後冷戰時期的轉變也給維和行動帶來類似卡爾（E.H. Carr）在20年危機中描述的不足，自願性的道德主義如何影響權力政治的邏輯（Chandler 2017, 5）。內戰的次數遠高於國家間戰爭的次數或為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國際社會在決定與實際部署維和行動的過程中，充斥著代理難題（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s）的現象，導致第三方干預（the third-party intervention）無法發揮預期效果，在要求部署維和行動的國家與聯合國之間、聯合國與提供部隊及資金的會員國之間、以及維和部隊的第一線主管（例如指揮官或區域性的國際組織）和聯合國之間都存在類似問題。

本文的目的在於透過檢視這些以維和行動為核心的研究，呈現代理難題在實踐上對國際組織的衝擊與在理論上對國家間合作的影響。新自由主義的核心關懷為在無政府狀態下，國際組織的實踐與規範的建立能否促進國家間的合作。代理難題雖為相當普遍的現象，但學界對代理難題的討論卻集中在實踐上的影響，卻忽略了其對新自由主義—特別是典則理論—的影響。本文認為代理難題的存在弱化了國際典則與規範促進國家間合作的效力，而新自由主義的相關文獻似忽略了這個現象。

本文藉回顧學界對維和行動及第三方干預的相關研究，嘗試與代理難題對話以凸顯相關研究的貢獻，並嘗試與國際典則的合作理論對話以呈現現有研究的不足之處與改進建議。故本文第一步將檢視現有文獻如何看待聯合國、區域性國際組織與一般會員國在部署及參與維和行動中的合作與互動，以釐清這些國家之間的互動困難。其次，本文將檢視現有文獻如何看待維和部隊（代理

人)與地主國(委託人)之間的互動,以及維和部隊對「中止衝突」與「建構和平」的影響。在這些回顧的基礎上,本文將在代理難題的架構下呈現現有研究的貢獻。其次,本文將透過典則理論的內涵檢視相關研究是否仍有不足之處,特別是研究結論是否挑戰了典則理論的邏輯架構,特別是:重複博奕、國家對名聲的考量與議題連結是否為導致國家願意參與維和行動的通則化原因?聯合國近年以建立和平為目的的維和任務是否帶來更多的和平?聯合國長年以來對人道干預及人權價值的堅持是否如典則理論的承諾般影響參與維和行動的國家與部隊?。

維和行動是第三方介入最主要的形式,但其實踐已歷經兩次變化以因應衝突形態的變化。維和行動係「透過國際第三方的介入,藉多邊軍事、警察及民事人員,以防止、圍堵、調和及終結兩國或兩造敵意,以恢復或維持和平」(International Peace Academy 1984, 7)。在實踐上,任務授權的差異是區隔不同類型的最好指標之一(Doyle and Sambanis 2007, 324-334),¹另一個有效指標則是對部隊成員使用武力的授權(Katayanagi 2002, 51)。

冷戰期間,維和行動原僅部署在國家間的衝突,並以非武裝觀察員為主的監測停火,這類任務被稱為第一代維和行動(Katayanagi 2002, 42-43)。在1988年後出現的第二代維和中,聯合國允許部隊成員可在自衛情形下合適地使用武力(Katayanagi 2002, 47),同時也複雜化維和部隊的任務授權,賦予更多種類的任務,例如軍事、社會、人道、政治面向等鮮少出現在第一代維和的任務授權(Wood and Sorenson 2005, 3)。²而1990年代中期佈署在盧安達、波士尼亞與索馬利亞等地的困難任務與其失敗,導致聯合國再次調整行動方

¹ 這部分指稱的「任務授權差異」可分為兩個種類,第一種是在哈瑪紹三原則下的傳統維和,也就是佈署在國家間衝突、僅止於觀測停火的傳統維和。第二種則是聯合國前任秘書長蓋里(Boutros Boutros-Ghali)在《和平議程》(An Agenda for Peace)中,將新的任務授權區分為預防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和平製造(peacemaking)、和平維持(peacekeeping)及衝突後和平建設四類(the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等四類(United Nations 1992)。

² 也因為第二代維和任務目的的多樣性,因而又被稱為多面向維和行動(multi-dimensional peacekeeping)。

針，更進一步鬆綁成員使用武力的限制與擴大任務授權範圍，³因而又被稱為第三代維和行動（Bonyongye 2000, 85-86），而2000年普拉西米報告（Brahimi Report）的公布則進一步重申安理會在必要時應不吝於辨識蓄意侵略者與無辜受害者（李大中 2011, 66-67）；同時重申維和部隊自衛及保衛當地民衆的義務，並賦予更完備的能力。⁴

面對衝突形態的變化與對維和行動的挑戰，近年相關實證研究可謂汗牛充棟，⁵然而，這些文獻將更多的重心置於維和部隊的組成與部署方式對衝突後和平的影響。第一，國際組織賦予的任務或角色對戰後和平的影響，1990年代的索馬利亞是一個很常被研究的案例，但論點多集中在部隊缺乏部分功能（Yamashita 2012, 183; Melvern 2001, 102; Scott 2015, 1330）。第二，區域組織與聯合國之間的互動、非洲聯盟是一個常被研究的案例，特別著重在非洲聯盟的能力（capability）是否足以負擔維和任務、以及如何改善非洲聯盟與聯合國之間的協調問題（Poku, Renwick and Porto 2007, 1164; Sandler 2017, 1893; Williams 2014, 914）。第三，國家為何願意貢獻人員或資金參與維和行動，這類研究又以弱小國家或歐美國家為主，強調部門利益與價值觀的影響（Schörnig and Lembcke 2006, 223; Kathman and Melin 2017, 151; Lebovic 2004, 910-936）。第四，維和部隊的介入與表現對戰後和平的影響，特別是維和部隊的組成及國際組織的角色是否有助於建構較長時間的和平（Kydd 2006, 459-460; Favretto 2009, 253, 256; Ruggeri, Dorussen and Gizelis 2017, 178）。

觀察這些研究可發現渠等多在新自由主義的架構下探討導致維和行動成敗的原因，代理難題為渠等偏好的第一個架構，以國際典則（international regimes）為核心探討國家合作傾向的理論則是第二個架構。代理難題係為描述委託人（principal）與代理人（agents）之間的利益衝突。代理人未必能忠

³ 因為這類維和任務更進一步放寬使用武力，因而被認為是介於傳統維和行動與集體安全之間的灰色地帶（Frederking 2007, 45-46）。

⁴ 例如建議交戰守則（rule of engagement）：當部隊面臨其保護的民衆遭遇致命攻擊時，部隊有能力且有資格採取迫使攻擊方停火。（United Nations 2000）。

⁵ 這部分主要是指國外的相關文獻，國內對這類問題的研究似乎較少，相關論文可見（林俊靜 2009, 117-160；邱坤玄、許志吉 2005, 29-48；楊永明 1997, 23-40；鄒念祖 1996, 55-68）。相關專書則有（李大中 2011）。

實地反應委託人的利益偏好，分工的不明確、資訊的不對稱與利益的不協調可能是導致這個現象的原因（Oppenheimer 2012, 141; Steinberg 2010, 76），代理難題的架構也許是國際組織研究最常採用的一種路徑（Hawkins, Lake, Nielson and Tierney 2006; Oestreich 2007, 168-169）。國際典則為一系列圍繞國家的預期而匯集到既定的議題領域，並形成隱含明確原則、規範、規則與決策程序，⁶而因典則的重複賽局（repeat play）特徵，合作導致的未來報酬可能高於不合作產生的當前報酬，因而使國家傾向合作（Axelrod and Keohane 1993, 91）。

貳、國際社會的分工

一、國際組織的職責與互動

（一）全球性國際組織

全球性國際組織對維和行動的參與僅有聯合國，這類研究的重點有二：其一，聯合國內部的協調對維和部隊效能的影響，包括常任理事國之間的協調、部門間的協調成效，一般來說，聯合國內部的協調成果，特別是官僚機構間的協調，對維和部隊效能產生負面影響。其二，在千禧年計劃後，聯合國推出不少新的政策承諾，而維和行動佔據了聯合國多數資源，因而聯合國是否透過維和行動履行其承諾也被視為檢驗千禧年計劃以來一系列政策的指標之一。

聯合國內部協調將影響部隊的組成與效力，但其影響則多為負面。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間的協調是一個很重要的面向，常任理事國對任務內容與利益偏好的同質性越低，官僚部門的獨立性也越低，同時聯合國會更審慎地監視這個任務的進程（Allen and Yuen 2014, 629-630）。安理會與維和部隊之間的協調是另一個面向，隨著全球各地衝突數量的增加，安理會對維和部隊的期望更高，期待維和部隊防止暴力、保護弱勢社群、建立合法民主國家與可

⁶ 原則（principle）指對事實、因果關係和誠實的信仰；規範（norm）則為以權利和義務的方式確立的行為標準；規則（rule）則指專門對國家行動的規定或禁止；決策程序則為決定和執行集體選擇政策的過程與習慣。詳見：（Krasner 1983, 1-21）。

持續性的和平，但卻忽略部隊遭受攻擊的可能性越來越高（Bellamy and Hunt 2015, 1283-1284）。然而，安理會對維和部隊實力的過度強調卻反可能阻礙和平進程，蘇丹達富爾是一個很好的案例，聯合國的強勢政策反無助於交戰方在阿布賈（Abuja）的和平談判，因為聯合國武裝部隊的承諾提高了一方的期待（Waal 2007, 1046），但存在實力強大的維和部隊往往有助於推動談判（Ruggeri, Gizelis and Dorussen 2013, 403）。⁷

第三個面向則是聯合國附屬機構之間的協調不足，1990年代索馬利亞行動失敗的原因之一便是部門間的協調不足，致使部隊在缺乏情資的情形下誤判情勢（Melvern 2001, 102）。而即便聯合國內部歷經數次調整，負責人道救援的維和行動部（DPKO）與負責後勤運補的外勤支援部（Department of Field Support, DFS）之間的合作是否順暢仍影響部隊效率。⁸而因為聯合國內的諸多次級組織，例如難民署（UNHCR）、兒童基金會（UNICEF）及人道事務協調廳（OCHA）也都被賦予人道救援的職責，而聯合國外的許多政府間國際組織與非政府組織也有類似職責，這些組織都造成維和部隊更多困擾（Bellamy and Hunt 2015, 1287-1288）。

最後，維和行動一般也被認為是檢驗聯合國是否履行其承諾—特別是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重要指標之一。舉例來說，維和任務可能是聯合國浪費資源、傷害環境最鉅的業務，因而聯合國在2009年後由維和行動部、外勤支援部與環境署合作制訂新的內部環境政策，以減少影響（Scott 2015, 1330）。⁹其次，女性參與維和部隊的比例也被認為是檢視聯合國是否履行性別平等承諾的指標，但女性的參與仍是少數，且多限於警力部隊（Kirby and Shepherd 2016, 374-375）；然而，維和部隊給地主國帶來的治安挑戰也是常被提出檢驗的問題之一，維和部隊的人數每增加1000人，便會大幅增加

⁷ 1989年到2005年部署在非洲眾多維和行動的表現是很好的例子，部隊規模的增加同時也提升了叛亂團體與政府合作的可能性。

⁸ 而當安理會的權威、秘書處依會員國分配資源的能力與專精於後衝突建設的民事專家的知識與經驗這三個條件都具備的時候，這個情形依然存在，詳見：（Yamashita 2012, 183）。

⁹ 平均每120,000名維和部隊消耗超過1000萬公升的水資源，維和部隊每年排放的溫室氣體更佔所有聯合國附屬機構的半數以上。

部隊成員與當地女性進行性交易或性侵案件的可能性（Beber et al. 2017, 16-17）。第三，聯合國以人道主義為由的干預將有助於地主國之於永續發展目標的邁進有部分協助，特別是在公共衛生領域，但在其他領域（特別是識字率）的影響卻相當有限（Kim 2017, 636）。

（二）區域性國際組織

一般來說，區域性國際組織主導的人道干預在2000年後才較興盛，但不論是區域組織之間的協調或區域組織與聯合國之間的協調都存在相當大的問題。歐盟的經驗較為完整，其財力與軍事力量也較足以支持後衝突和平建設的任務，非洲面臨的威脅及其能力均較不足以應對頻率較高的人道危機，而其與聯合國及歐盟之間的協調也有相當大的問題。

區域組織與聯合國之間的協調是維和任務能否成功的充要條件之一（Yamashita 2012, 182），但區域組織的能力——不論是部隊的水準或財政能力——卻未必符合聯合國標準。聯合國和區域組織的合作在索馬利亞行動已凸顯不少問題，特別是部隊領導權的歸屬與缺乏戰略協調（Williams 2014, 914）。一方面，偏好貢獻部隊的國家均係因財政能力的不足與聯合國回饋的福利及補償，非洲國家尤為明顯（Sandler 2017, 1893），非洲國家對由非洲聯盟主導之維和行動的財務貢獻也相當不足，歐盟仍是主要的財政支持者（Poku, Renwick and Porto 2007, 1164）。另一方面，非洲各國提供的部隊未必符合聯合國的標準，例如當2003年部署UNMIL任務時，維和部隊原係由ECOWAS在當地的任務部隊（ECOMIL）改編而成，但聯合國於2004年1月便要求7個國家中的5個國家撤回部隊，係因渠等不符合聯合國標準（Coleman 2011, 530）。而去武裝化、戰後復原與再整合（disarmament,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 DDR）是處於後衝突重建階段國家最重要的議題，但非盟在這部分的表現仍不佳（Poku, Renwick and Porto 2007, 1165）。

然而，對非洲聯盟來說，聯合國與歐盟的協助雖為必要條件，但三方的協調也帶來許多問題。在利比亞與盧安達的案例中，非洲國家發現國際社會很難在危機發生之初便介入，因而傾向建構充足的實力以在必要時介入（Nkiwane 2001, 105）。然而，因非洲國家將處理人道危機視為聯合國的職責與聯合國介入有助於獲得國際社會認可、財政的支援與後勤訓練的協助（Coleman

2011, 530)，聯合國的介入有其必要性，但達富爾混合行動（UNAMID）卻反映了兩者的協調問題，即便非洲聯盟在達富爾衝突的表現大幅降低對平民的暴力威脅，但聯合國卻直到2007年方正式授權執行混合行動（Curran and Woodhouse 2007, 1064-1068）。

另一方面，非洲聯盟的能力雖有不足，但卻希望進一步提升其在維和業務中的自主性。當非洲聯盟成立後，英國、法國與其他歐盟國家便協助培養維和能力，特別著重在發展危機管理的框架，但僅限於提升預防衝突的能力，¹⁰即便非盟希望表達意見，歐盟仍要求這類合作必須在其主導之下（Yamashita 2012, 183）。舉例來說，雖然非盟從2003年嘗試將其對和平與安全的規範帶入維和實踐中，但因其能力（特別是財政與後勤）的不足而必須受制於其他國家。¹¹最後，非洲國家語言及文化的多樣性也成為非洲聯盟提升維和能力的阻礙之一，法語非洲與英語非洲國家之間成為不同群體，在威脅的變化與定義雖有共識，但兩群體之間的分工意識導致非盟很難將其合作系統化（Chafer and Cumming 2010, 1146）。

二、國家與國際組織的互動：國家為何貢獻

從現有研究看來，歐美國家與非歐美國家貢獻維和行動的方式與動機大不相同。一般來說，歐美國家/已開發國家對維和行動的參與受到價值觀或外交利益的影響較大；相反地，非歐美國家/開發中國家的貢獻受到部門利益和政權穩定性的影響較大。這樣的差異與民主化及經濟發展的程度有相當大的關係。

（一）已開發國家為何貢獻

源於民主價值的信仰，歐美國家一直都是維和行動最主要的貢獻者，不論是在部隊或資金上。一般認為，歐美國家貢獻的部隊人數可能會少於非歐美國家，但在後冷戰時期中，歐美國家的人員貢獻仍是主力，係因這些國家對民

¹⁰ 包括決策單位(和平與安全委員會)、情報蒐集中心(大陸早期預警系統)、外部的諮詢實體與軍事武力(非洲預備武力)的建構（Chafer and Cumming 2010, 1140）。

¹¹ 非洲聯盟駐索馬利亞特派團（The African Union Mission in Somalia, AMISOM）是一個很好的例子（Vines 2013, 100）。

主價值的信仰根深蒂固（Lebovic 2004, 910-936），例如1990年代美國社會大力支持美國參加維和行動，美軍也曾在外國指揮官指揮下服役（Chapman and Reiter 2004, 891），但即便美軍在海外死傷慘重，公眾仍認為政府有道德義務協助保護平民（Kreps and Maxey 2017, 1827-1828），基督教團體的施壓與遊說正是美國介入達富爾問題的原因之一（Smith 2013, 71-92）。加拿大與英國的參與也深受公眾意見影響（Paris 2014, 274-307; Reifler, Scotto and Clarke 2011, 245-266）。相對的，德國社會的態度雖相對謹慎，但僅止於反軍國主義與大西洋主義仍是公眾判斷支持與否的主要依據（Mader 2017, 1290-1314）。

然而，正因為民主價值促使民主國家願意貢獻任務，民主國家也因此而更難容忍部隊的傷亡（Schörnig and Lembcke 2006, 223），因而造成額外的協調成本，但若民主國家同意支持維和行動，他們的承諾也因民主價值而相當堅實。在協調問題上，美國與歐盟對巴爾幹半島維和任務的協調是一個很好的案例，歐洲國家抱怨美國更保護其部隊，迫使歐洲軍隊承擔死傷風險，而同時歐洲各國已承擔多數資金（Chalmers 2001, 576）。民主價值與鑲嵌其中的人道主義導致民主國家對部隊傷亡的忍受度較低，也促使這些國家較傾向承擔更多的財政責任，因此冷戰結束後迄今，較富有的國家願意承擔更多的財政責任（Roper and Barria 2010, 619）。整體來說，雖然民主國家之間很難協調造成彼此利益矛盾的自由主義原則，因而對是否介入衝突的考慮會相對猶豫，但若同意介入，渠等的承諾會相當堅實（Lebovic 2004, 933）。

最後，即便是深受民主價值影響的歐美國家在決定是否參與維和任務之際，實際的政策利益也有其重要性。若參與維和行動越有助於補充政府在其他政策的不足或失分，國家越傾向派遣部隊參與（Ward and Dorussen 2016, 402）。舉例來說，擴大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也是法國與德國決定參與的考量之一（Utley 2006, 63-80），更是日本一直以來對維和行動貢獻資金與人員的動機之一（Ishizuka 2013, 206）。

（二）開發中國家為何貢獻

非歐美國家/開發中國家的貢獻受到部門利益和政權穩定性的影響較大，這些國家多半都有更實際的內在利益考量，部門利益是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因素，因為聯合國給予維和人員的薪水往往高於本國給予的薪資；另一方面，部

分國家參與維和行動係為減少國內政變風險或提升政權正當性，非洲國家尤為顯例。

這類國家的勞力成本往往較低，也因而導致他們較願意貢獻部隊，而不是資金。衝突造成的危機（特別是衝突區域的地理連接性與難民的數量）將影響國家派遣部隊參與維和行動的意願（Bove and Elia 2011, 699-714），但部隊收入方為這類國家願意參與維和行動的重要原因之一（Gaibullov, George, Sandler, and Shimizu 2015, 727-742），越貧窮的國家則越傾向參與維和任務，不論是參與的次數或人員的數量（Victor 2010, 227），Kathman與Melin的研究則精確地指出，派遣人員參與維和行動取得的資金或資源往往是小國熱衷參與維和行動的原因之一（Kathman and Melin 2017, 151）。斐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斐濟每年自維和行動取得的資金甚至超越傳統產業的貢獻（Komai 2015, 115）。

另一方面，這類國家的政權穩定度也可能低於已開發國家，因而透過參與維和行動強化政府在國內的正當性也是他們願意參與維和行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1989年到2000年間，非洲合法性較低的國家傾向參與維和行動以強化政府的生存能力（Victor 2010, 226），例如2004年後的盧安達，透過支持非洲聯盟佈署的維和行動嘗試挽救其不堪的人權紀錄（Beswick 2010, 750），藉此轉移對政府不當行為的可能關注及提升政府的合法性（Victor 2010, 217-229）。另一方面，這類國家面臨政變的風險也較高，因而滿足軍隊的部門利益與偏好，並將部隊派遣出國以減少政變風險也是原因之一（Kathman and Melin 2017, 151）。

最後，中國是這類研究一個新興的案例，這與中國近十餘年對維和任務顯著增加的財政與人力貢獻有相當程度的關連性，然而，這類研究的設計與論點似仍莫衷一是。從方法來看，不少研究著重分析中國在安理會的投票行為變化（許志吉 2010, 75-110; 許志吉 2002, 87-102; 林文程 2006, 1-38; Stähle 2008, 631-655），但這個方法已被認為不足適當地測量國家對國際組織的真實態度（Martin and Simmons 1998, 729-757），而部分研究則著重檢視偏好參與的任務類別，例如和平建設中與發展相關的任務為中國最偏好的種類（Zhao 2012, 102-120）。而從論點而言，部分研究認為隨著參與次數及頻率的增加，中國

更願意接受全球規範（Huang 2011, 257-210; Stähle 2008, 631-655），但這類研究卻也被中國國內的人權紀錄挑戰（Sikkink 2017, 242）。而另一個相當有趣的論典則著重於中國處理內政的需要，亦即中國首好偏好參與和平建設、而其次偏好參與後衝突建設的原因在於希望學習協調不同部門以處理國內災難、壓制社會抗議事件的動機有關（Foot 2014, 1093-1094）。

三、小結

代理難題普遍地存在於聯合國內部機構的協調、重要國家之間的協調、國際組織之間的協調中，而這個普遍現象不僅在實踐上帶給地主國不少困擾，同時也在理論上挑戰了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命題——國際組織的實踐與規範的建立有助於促進國家間的合作。

在實踐上，這些源於分工不明或利益衝突的協調問題均弱化了維和部隊的效能與聯合國的維和能力。在聯合國內部機構的協調上，安理會對建立合法民主國家與可持續性和平的期待賦予維和部隊更沉重的任務，同時也忽略處理內部機構在人道救援職責上疊床架屋的問題，造成維和部隊更多困擾。而在重要會員國之間的協調上，當常任理事國對要求佈署任務的地主國與當地情勢的認知有相當差異之際，不僅將使官僚部門的獨立性降低，更可能使維和任務的佈署胎死腹中，敘利亞案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美國、法國與英國對敘利亞情勢的認知及對「國家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2P）的立場和中共與俄國不同，因而致使聯合國迄今未能在敘利亞佈署部隊。

此外，國際組織間的協調與國家間的協調同時凸顯了理論上的挑戰，也就是規範的建立是否有助於促進國家間的合作。現有研究指出國際組織之間的協調問題源於部隊領導權與財政責任的劃分，非洲聯盟與歐盟的互動是很好的例子，即便歐盟負責多數的財政責任，非洲聯盟仍希望取得部隊主導權，這個現象反映著雙方分工的不明確與利益的衝突，雙方的合作也因此代理難題而出現困難。

參、維和部隊的介入背景及任務性質

這類研究揭示著兩個很重要的問題：進行人道干預的第三方對其介入的衝突背景是否熟悉？第三方干預的目的究竟是為了終結暴力衝突或締造和平？在許多維和行動的案例中，國際組織或維和部隊對其介入的衝突背景並不夠熟悉，導致脆弱的和平建構在假性的衝突終結之上，當介入的第三方撤離，衝突再度爆發的可能性也會提高。然而，若國際組織僅關注締造和平，以民事人員為主的維和部隊根本無力終結衝突，相反地，若僅關注終結衝突，以軍事人員為主的維和部隊也無力締造長久的和平，進而造成國際組織在選擇上的困難。

一、維和部隊對衝突背景的理解對和平的影響

聯合國授權維和部隊進行第三方干預之前，內戰或衝突的背景影響干預成效甚鉅，這類影響分為兩個層面：第一是維和部隊或干預者對衝突背景的理解程度，例如聯合國或維和部隊是否瞭解當地的政治、文化、經濟與社會生態。第二則是衝突的複雜程度，例如參與衝突的行為者數量、已持續的衝突時間、交戰方對維和部隊中立性（impartiality）的判斷等。

就第一個層面來說，在很多的案例中，維和部隊並沒有充分的關注地主國在政治或文化上的特殊性，特別是一些政治制度原已高度不穩定和世襲制國家的運作模式（Waal 2009, 101）。若第三方干預者能強化對地主國的理解進而調整維和部隊的功能與組成，任務成功的可能性也會隨之提升，否則過早舉行選舉或因停火而認定為完結的內戰終結均可能提高選舉後再度發生衝突的風險（Brancati and Snyder 2011, 485），或因缺乏對衝突方文化背景的理解而未能讓地主國內部建立和平承諾而使援助或干預功虧一簣（Lund 2015, 6-7），例如「對話」（dialogue）對深受蘇聯教育的人們來說意味著強化自己深信的事實與防衛對手對立場的攻擊，這與歐美國家定義的對話並不相同（Allen 2015, 69-70）。

維和部隊在伊拉克、科索沃與東帝汶的行動是很好的案例。在第二次伊拉克戰爭前，海珊與其親信對當地警察體系的掌握已透過政經與社會利益鑲嵌在部族關係中，特別是其與巴格達西北部的遜尼派部落之間的合作，因而維和部

隊的首要任務便是重建當地的警察力量（Day and Freeman 2003, 303-307），然而，該地的維和任務仍卻仍受阻於走私、地下經濟與犯罪等問題（Gökalp 2017, 191），在科索沃的案例中，2002到2007年間，維和部隊盡可能地滿足科索沃派系領袖的政治意見，並使當地局勢逐漸穩定（Kelmendi and Radin 2016, 983-1011）。另一方面，在東帝汶的案例中，維和部隊因聯合國內部政治因素而更傾向保護其工作人員與成員國的利益，而維和部隊的作為也被當地視為新殖民主義的實踐（Day and Freeman 2003, 309）。

就第二個層面來說，參與衝突的行為者數量、已持續的衝突時間與維和部隊的效能成反比，但若戰爭的交戰方認為維和部隊不中立，反可能有助於衝突的落幕。在任何一場內戰中，擁有否決權的參戰方越多，達成和平的難度越高，因而維和部隊介入的首要之務應為界定有能力否定任何調解的參戰方，並先尋求勢力最大的兩個交戰方之間的和平協定（Cunningham 2006, 891）。然而，不斷重複的衝突也會增加維和部隊作業的困難度，無法協助交戰方達成權力分享的協議（Walter 2015, 1251）。最後，若存在衝突方認為介入的第三方帶有偏見，或介入的第三方並不遵守中立原則等情形，一般來說，衝突的可能性、層級與對平民的傷害會隨之提升（Wood, Kathman and Gent 2012, 647-660）。然而，也有研究根據1945年到1999年間國家間的衝突指出，因為強調中立的第三方干預並不偏袒任何一方之故，其對中止衝突的效果自然較低，反可能延長衝突時間（Regan 2002, 55-73）；而若第三方在介入前已被認為不中立，當第三方降低偏見時，談判很可能因為衝突方懷疑第三方將武力介入而失敗，南斯拉夫與義大利在二次大戰後的領土爭議便為顯例（Favretto 2009, 253, 256）。

二、維和部隊的任務性質與規模對和平的影響

這類研究很明確地指出三個重點：第一，維和部隊的存在有助於結束衝突，但不見得有助於建構和平。第二，維和部隊的規模對中止衝突的影響力成正比，部隊規模越大，其中止衝突的能力也越高，但維和部隊執行仲裁的效力則取決於他們是否能獲得有關方信任。第三，維和部隊部署時間與衝突後和平的時間成正比，維和部隊部署越久，衝突後和平狀態的持續越久。

一般來說，維和部隊的存在有助於結束衝突。統計研究指出，若僅部署小規模20人次的維和部隊也可使衝突持續的可能性從90%下降到75%（Ruggeri, Han Dorussen and Gizelis 2017, 178）。而即便維和部隊沒有任何明確任務授權，維和部隊的部署及監督仍有助於降低交戰方之間的不確定性而有助於停火，例如在國家間的衝突案例中，僅被賦予觀察任務的維和部隊便有這樣的效果，但武裝部隊在相同條件下卻不具備這個效果（Fortna 2003, 344-345, 359）。其次，維和部隊的存在有助於制裁的實踐，例如維和部隊參與的武器禁運效果會較高（Fruchart et al. 2007），而對地主國政府的制裁必須著眼於戰鬥能力的消滅，而不是經濟或特定的軍事制裁，如此方能減少衝突的死傷成本（Hultman and Peksen 2017, 1334-1335）。

再者，調解更是維和部隊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衝突的嚴重程度一而非直觀的時間壓力一將影響第一線部隊對調解方式的選擇（Wall and Druckman 2003, 693-705），而由於誠實是成功調解的必要條件，類似聯合國這類長期從事仲裁的國際組織，長久的誠實聲譽更為重要（Kydd 2006, 459-460）。然而，即便是強力而誠實的第三方主導的干預，也可能只帶來短暫的和平，衝突的原因與成本並未改變，衝突將因第三方的撤離而再起（Beardsley 2008, 737）。

這也延續到這類研究關注的最後一個重點，也就是為何維和部隊的部署時間與衝突後的和平成正比（Beardsley and Lo 2014, 383），因國際組織的目標選擇影響維和部隊的組成，而部隊的組成將影響部隊建構和平的效力，因而維和部隊的存在不必然有助於建構和平。維和部隊的任務往往是說服交戰者簽署並執行和平協定，當和平降臨之際，維和部隊已無任何角色（Walter 2015, 1225），同樣的，在很多案例中，維和部隊未能參與和平協定的談判（Beardsley and Lo 2014, 383），這些可能性加劇了「『短暫和平』的可能性」，衝突的根源並未消失，只是因為第三方的強力介入而被壓制。因而第三方在衝突結束後的執法對和平的維持至關重要，不但可嚇阻機會主義者，更可強化社會規範、重建社會信任（Mironova and Whitt 2017, 2095）。即便第三方在衝突結束後傾向撤出，但第三方仍應提供相關資訊給予衝突方，才能阻止內戰再度爆發（Mattes and Savun 2010, 523），這或許是因為以軍人為主體的維

和部隊的功能多半止於終結暴力，而以民事工作為主的多面向維和部隊缺乏終結暴力的能力，造成聯合國的介入得以成功的中止衝突，但卻無法帶來長久和平。

三、小結

國際組織、維和部隊與地主國三方的互動是這類文獻關注的核心，渠等著重討論三者之間的代理難題與這些難題對恢復和平的影響，特別是維和部隊對地主國的瞭解是否充足、以及國際組織給予部隊的任務授權與規模是否有助於建構和平。

在代理難題的架構下檢視這些文獻，渠等多暗示著資訊失衡導致的代理難題將降低國際社會結束衝突與建構和平的努力。在資訊失衡導致的代理難題中，維和部隊對衝突原因與地主國背景的掌握不足導致任務事倍功半，例如維和行動在伊拉克與科索沃的實踐；而國際組織的目標選擇也可能因對這兩個原因的掌握不足而使衝突在部隊撤出後再度爆發，黎巴嫩與中東不斷反覆發生的內戰是很好的案例。

進一步來說，國際組織對衝突原因或地主國背景的掌握不足並不會挑戰新自由主義的論點，但若這類資訊失衡導致的代理難題另有成因，例如國際組織偏好授權特定任務，而這類任務卻不符合地主國實際需要？這個現象確曾存在於維和行動的實踐，也就是在1990年代以來聯合國最偏好授權的「衝突後和平建設」任務，這類任務的內容與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高度重疊，和平建設與國家建設這兩個概念也常被交替使用（Chandler 2017, 8）。聯合國迄今對「衝突後和平建設」任務的偏好源於後冷戰時期對民主、自由與和平的期待，誠如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Anna）於1997年直言「支持民主化已成為我們（聯合國）主要關注焦點之一」（Paris 2004, 13-39）。

因而，聯合國對任務授權的偏好實踐反而為新自由主義帶來更多的挑戰，類似烏托邦主義對國際聯盟的過度期待，聯合國對和平建設也有著一廂情願的想像。誠如Anna K. Jarstad所言，衝突後和平建設的目的在於建立可持續性的和平，因為衝突很難被完美地解決，但民主應可以和平手段管理衝突；而對民主的期待促使決策者期待地將民主化與和平建設視為相互正向影響的概念（Jarstad 2008, 18-19）。

肆、貢獻與不足之處：與代理人模式及典則理論的對話

一、現有文獻的貢獻：「協調」對第三方介入／維和行動成效的影響

前述回顧的文獻大致呈現了現有學界對維和行動的研究，也凸顯了「協調」與「衝突後和平時期的長短」是這類研究關注的焦點。以「協調」為核心的研究指出國際社會在決定佈署維和行動之前及佈署之後，各方的參與者對維和行動均有不同的利益偏好與期待，如何協調這些參與者的差異係為維和行動能否成功的第一要件，其次方為維和部隊如何協調地主國交戰方的差異。另一方面，雖然衝突後和平時期的長短取決於維和部隊的佈署時間，但也許更重要的關鍵在於維和部隊如何重建地主國破碎的社會信任，也就是何時佈署以民事人員為主的多面向維和部隊。

回顧代理難題的定義，在三種狀況下可能產生代理難題：第一，分工的不明確可能會導致責任劃分的空隙，過多的代理人或委託人都可能導致這個現象，致使委託人無法完整地監督代理人的作為。¹²第二，代理人擁有的資訊不但較委託人豐富，後者接受的資訊亦由前者過濾，後者的期待與偏好可能因此被扭曲（Oppenheimer 2012, 141; Oestreich 2007, 168-169）。第三，委託人的利益不必然等同於代理人的利益，代理人可能對委託人隱藏部分可行的選項或選項後果的評估，引導委託人選擇代理人期待的選擇（Steinberg 2010, 76）。在這樣的架構下，表1呈現了現有研究對維和行動執行過程中指出的六個協調問題：聯合國的內部協調為第一個問題，不論是常任理事國對佈署行動的利益考量或國際官僚機構職責重疊導致的互動問題，常任理事國對佈署行動的利益分歧越高，聯合國越傾向縝密監視維和部隊的行動，同時官僚機構的職權重疊也造成分工不明的代理人難題。第二，聯合國與區域組織之間的協調也有分工

¹² 這類問題在國際組織中最為常見，因為委託人與代理人的數量通常都是複數，導致雙方均可輕易地找到不履行義務的藉口，詳見：（Hawkins, Lake, Nielson and Tierney 2006）。

表1 維和行動現有研究與代理難題的對話

行爲者	角色	互動對象	代理難題		
			分工不明	資訊失衡	利益衝突
聯合國 / 區域組織	委託人	代理人：維和部隊	○	○	
	委託人	代理人：區域組織	○		○
	代理人	委託人：會員國	○		○
	代理人	委託人：地主國		○	○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問題，然而，這類源於人力品質與資金不足的問題雖不嚴重到危害任務進行，但聯合國必須更快地肩負更多的責任，特別是聯合國與非洲聯盟之間的合作。

第三，區域組織之間的協調問題出現在責任與指揮權的劃分，究竟應該由該地的區域組織主導或由能力較強的區域組織主導？這個問題不僅出現在非洲聯盟與歐盟的合作，也是許多國際合作的難題，而這個分工問題帶來的不僅是分工不明的代理難題，同樣也產生利益衝突的代理難題，非盟嘗試將其規範帶入合作框架，以打造符合其需要的維和力量，但這點卻不為歐盟樂見。

第四個協調問題則存在於國家與國際組織之間，不論是一般會員國與國際組織或要求佈署維和行動的地主國與國際組織之間，前者可能造成分工不明與利益衝突的代理難題，後者則可能造成資訊失衡與利益衝突的代理難題，並可能導致維和行動僅能終結衝突，而無法締造和平。

以一般會員國與國際組織的互動來說，雖有部分研究指出對民主價值與自由人權的信仰促使歐美國家願意投身維和行動，但這個因素也限制這些國家貢獻的偏好。而更關鍵的因素其實在於維和行動的佈署是否符合國家利益，特別是關鍵部門利益的偏好，這個傾向不僅在已開發國家中存在，在開發中國家更為顯著，但這卻可能造成一般會員國與國際組織之間因利益衝突而起的代理問題。

一般會員國同意委託國際組織進行第三方干預，但國際組織進行第三方干預的目的多著眼於人道危機的解決，這與多數會員國的目的相左，因而造成兩造的利益衝突。進一步來說，會員國對維和行動的貢獻屬於自願性質，國際組

組織很難平均劃分會員國之間的責任，形成責任與權力之間的空隙，使維和行動的實踐往往較符合特定類型國家的部門利益，特別是在部隊人員的招募上，發展中國家透過維和部隊的派遣獲得不少經濟利益，但卻造成聯合國在管理上的難題與地主國更多的災難，維和人員在地主國犯下的性侵案件是很好的案例。

最後兩個協調問題則出現在要求佈署維和行動的地主國、國際組織與維和部隊三者的互動中，三者互動產生的代理難題對解決衝突與建立和平的挑戰較大。就地主國與國際組織之間的互動來說，民主國家對部隊死傷的承受度較低，而承受這些壓力的國際組織往往將重點置於部隊的保護，而不是履行對地主國的承諾，例如東帝汶，進而呈現國際組織與地主國之間利益衝突的代理問題。

在國際組織、維和部隊與地主國之間存在兩個因資訊不對稱而發生的代理難題，國際組織未能及時瞭解維和部隊執行任務的情形，舉例來說，安理會對維和任務的審視多以半年或一年為一期，除非該任務曾發生相當嚴重的傷亡或常任理事國間對該任務的利益紛歧太高，在這樣的背景下，國際組織與維和部隊之間便出現資訊落差，國際組織未必能即時更新任務授權，例如從中止衝突轉變為監督停火協定、或從監督停火協定轉變為協助戰後復員。最後一個則是維和部隊與地主國之間的資訊不對稱，維和部隊鮮少由地主國人員參與，對地主國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背景也不熟悉，在佈署前期很可能因為誤解而產生衝突，也可能因此事倍功半。

二、不足之處：與新自由主義的對話

新自由主義的核心關懷之一為在無政府狀態下，國際組織的實踐與規範的建立能否促進國家間的合作，而面對這樣的核心議題，新自由主義歷年也發展許多深入討論，典則理論（regime theory）的討論尤以此為核心。

典則理論認為規範（norm）的存在有助於以權利和義務的方式確立的行為標準，也有助於國際社會約束國家行為。遵守或違背規範的代價為推動國家改變政策的動力（Ikenberry and Kupchan 1990, 293; Klotz 1996, 188-189），媒介可能包括國際典則的實踐與在多邊架構下的合作（Kydd 2004, 45; Mansbach and Rhodes 2009, 177-178），國家可能透過立法明確地規範國際典則賦予的義

務，並授權第三者實踐、說明與監督（Abbott et al. 2000, 408-412）。進一步來說，聲譽（reputation）與議題連結（issue linkages）則是國際組織與規範影響國家行為的關鍵機制。在作為與否之間對聲譽影響的評估為影響國家行為的關鍵（Sterling-Folker 2002, 62），而在多元化的議題領域中，各國長期將能各自滿足彼此在特定領域的損益並達成合作（Axelrod and Keohane 1993, 99），因而即便單以議題連結卻無法解釋20世紀的情形，但若將聲譽視為自變數之一，議題連結依然可解釋20世紀的國際合作（Tomz 2007, 7-9, 240-241）。

綜言之，典則理論提出了三個重點：第一，國際典則的存在—包括國際規範與國際組織—有助於國家間的合作，因為遵守或違背規範的代價將使國家日益遵守規範。第二，國際社會議題的多樣化、議題間的連結與國家對聲譽的評估降低國家不合作的意願與可能性。第三，國家可透過立法明確地規範國際典則賦予的義務，並授權第三者實踐、說明與監督。

首先，國際社會議題的多樣化與議題之間的連結與國家對聲譽的評估將降低國家不合作的意願與可能性，但非民主國家對維和行動的立場卻沒有明顯變化，國家利益則是驅動較強大的非民主國家參與的關鍵，而部門利益是驅動較弱小的非民主國家參與維和任務的關鍵。非民主國家對維和行動的參與緣於利益考量，維和行動背後的人道干預及國家保護責任對這些國家的影響似乎並不顯著。對強大的非民主國家來說，聲譽與議題連結或許僅是促成合作的充要條件，真正的關鍵仍在於參與是否符合國家利益—特別是對主權的堅持與地緣政治的利害計算。除俄羅斯與中共仍堅持主權高於人權之外，兩者也不同意「國家保護責任」原則及實踐（Kassim 2014, 30; Newman 2015, 134），雙方一再否決在敘利亞部署維和任務的議案是很好的例子，論者認為此係因兩者對主權的堅持與地緣政治的考量。¹³

而對相對較弱小的非民主國家而言，部門利益是驅動渠等參與維和任務的關鍵，特別是財政收入的考量、滿足軍方的期待與降低政變風險等三個原因。

¹³ 俄羅斯將前蘇聯地區視為其勢力範圍的一部分，對莫斯科來說，歐美國家正在系統性地弱化莫斯科對這些地區的影響力，人道干預為渠等採取的主要措施之一，因而俄羅斯對部屬在其周圍的維和行動較具戒心（Sussex and Kanet 2015, 235）。

而從Gaibullov等人的研究看來，部隊收入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解釋變項，Victor的研究則指出合法性較低的非洲國家傾向派遣部隊參與維和行動以強化政府的生存能力，Kathman與Melin的研究則更進一步闡述派遣部隊參與維和任務有助於滿足軍方的部門利益與偏好，同時降低軍方發動政變的能力，因而有助於減少政變的風險並提升政府的生存能力。

這些研究暗示著非民主國家對維和行動的參與並非如典則理論的期待，也就是多樣性議題之間的連結與國家對聲譽的評估將提升國家的合作意願。雖然這些國家多半傾向支持維和任務，但不論非民主國家是否強大，導致這些國家參與維和任務的因果機制均異於典則理論的承諾，這個現象便值得進一步討論是否需要重新檢視國際典則的理論承諾與架構，因為因果機制的不同部分地影響了第二個挑戰——也就是部隊紀律不彰的現象與為何國際組織與規範未能如典則理論的承諾改變國家的行為。

其次，近年偏好貢獻人力的國家並非因接受人道主義的價值而貢獻人力，因而導致部隊紀律不彰，但聯合國也未著力規範部隊紀律規範，這兩個現象挑戰了典則理論對改變國家行為的論述。因為導致這些國家願意派兵參與維和任務的動機與典則理論的解釋有異，這些國家貢獻的部隊反而在實踐上挑戰了維和行動背後的人道精神。部隊紀律始終為維和行動與地主國帶來嚴重問題，¹⁴當然，這些國家貢獻部隊的動機異於典則理論設立的前提，因而使典則理論的第三個重點——也就是國家透過立法明確地規範國際典則賦予的義務——因為前提要件的不存在而無法適用。

然而，聯合國未著力規範部隊紀律一事則侵蝕了典則理論的第一個重點，也就是國際典則的存在有助於國家間的合作，遵守或違背規範的代價將使國家日益遵守規範。歐美國家對維和行動的貢獻源於渠等對自由人權的肯定，這

¹⁴ 聯合國始終不願完全公開這方面的資料，在定義上，聯合國將維和人員的犯罪類型區隔為兩類，第一類為包括：性虐待、性剝削、謀殺、貪污、走私、綁架、傷害等罪名，第二類則包括交通違規、簡單詐欺、契約糾紛、基本的管理問題等（United Nations 2018a）。若以這兩類的定義區分，近三年（2016～2018）的第一類犯罪平均每年為146.67件，第二類犯罪平均每年為440.3件（United Nations 2018b）。而若檢視聯合國公佈的性虐待及性剝削案件數量，可發現第一類犯罪多為性虐待及性剝削案件，且其中近半數為針對未成年孩童的犯罪行為（United Nations 2018c）。

個支持也影響渠等對部隊紀律的管理，而當其他國家的貢獻則源於財政或部門利益的考量之際，聯合國應可透過制度的修訂要求這些國家改善其部隊紀律，但聯合國對此似無作為。聯合國忽視規範部隊紀律一事導致典則理論主張的「『遵守』或『違背』規範的代價」不存在，而這個忽視不僅侵蝕了典則理論第一個重點的前提要件，也就是遵守或違背規範的代價不足，致使國家未日益遵守規範，更重要的是挑戰了聯合國對人道干預及人權價值的尊重與實踐，忽視部隊紀律不彰與因此導致的人道危機暗示著，對聯合國來說，招募充足人力遠重於招募品質的人力，即便招募而來的部隊可能違背人權價值。

最後，中止衝突與建立和平係維和行動最大的目的，但實證研究顯示以和平建設為主的維和任務往往較難滿足目標（Jarstad 2016, 101），反可能保持或提升衝突再起的可能性，這個現象源於聯合國對民主化的高度期待、以及其與地主國之間因此產生的資訊失衡。雖有研究認為維和部隊在地主國民主化的過程中並沒有明顯的正面或負面影響，且有助於穩定局勢（Fortna 2008, 39-40），但平心而論：第一，威權政體的轉型與民主化是一個冗長耗時的過程，而內戰後的民主化也必須同時伴隨國家建設與和平建設的過程才可能成功（Jarstad 2016, 90-91）。第二，仔細檢查主張類似結論的研究，均可發現他們對研究條件的前提，例如僅處理小範圍時間（Diehl 2016, 155），或縮小他們對維和行動的定義。¹⁵

是以，以建設和平為目標的維和行動對地主國和平的幫助可能不是正面的，最終反可能近似Richmond（2004, 97）所說，「各方同意之偽軍事干預共識的行動，目的在於建立一個自由國家」，實際上，相關研究也暗示了類似行動並未消弭衝突的根源，因而主張維和部隊的存在越久，衝突後和平時期越長。然而，若以和平建設為主的維和任務未能更有效地建構和平，為何聯合國近年推動的維和任務仍以此為主？這或許源於堅持自由主義信仰的同時，聯合國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現實：正如Jahn（2009, 210-229）所言，導致衝突的經濟與政治因素均伴隨著文化與歷史背景，而自由主義式的外交政策卻忽略了文

¹⁵ 例如Virginia Page Fortna對維和行動的定義便似忽略了多面向維和部隊的任務，其定義可見：（Fortna 2008, 41）。

化與歷史脈絡，因而造成民主干預的悲劇。而聯合國對自由人權與人道干預的堅持，促使聯合國未能以最有效的方式中止衝突，反深陷在以更長遠目標為主的建立和平之任務泥淖中。

這樣的現象類似Carr（2016, 13）在20年危機中對烏托邦主義的觀察：「烏托邦主義將政治理論視為政治實踐者應履行的規範」，同時也隱藏著因此而產生的聯合國與地主國之間的資訊失衡——也就是聯合國因主觀期待而忽略了地主國客觀條件的需要與限制。聯合國前任秘書長安南直指民主化是聯合國主要的關注焦點之一，許多研究更直指在和平建設類的任務中，僅次於穩定和平，推動地主國的民主化是國際社群的核心目標（Zürcher et al. 2013, 20），但在實踐上，聯合國對民主的期待使其忽略地主國當下的條件是否適合推動民主化，並混淆了和平建設與國家建設的概念，因而也使一些新興強權（例如中國、印度、俄羅斯、伊朗）與區域組織（例如美洲國家組織、非洲聯盟與阿拉伯聯盟）反對這類的任務（Thiessen 2011, 116）。

伍、結論

綜言之，本文回顧了許多以維和行動為研究客體的文獻，並透過代理難題的架構呈現了他們的貢獻，可區分為國際組織內部的協調問題、以及會員國、國際組織與地主國之間協調問題。一方面，國際組織內部的協調問題凸顯了維和行動這類人道干預在實踐上的困難，許多擁有意願或使命的國際組織在人道干預實踐上的互動反而阻礙了人道干預的推動，分工不明與利益衝突是這類互動最常出現的代理難題。另一方面，會員國、國際組織與地主國之間的協調則凸顯了資訊失衡與利益衝突的代理難題，國際組織與維和部隊未必切實瞭解衝突的背景，同時國際組織（特別是聯合國）對民主和平與民主化的高度期待，使其忽略了地主國客觀條件的需要與限制，同時因為聯合國對維和使命的期待越來越高，導致許多維和行動仍深陷泥濘或以失敗告終。

在回顧這些文獻的基礎上，本文的問題意識——代理難題的存在是否弱化了國際典則與規範促進國家間合作的效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回答，在分工不明、資訊失衡與利益衝突等三種不同原因的代理難題中，源於利益衝突的代理難題

相當程度地降低了國際典則與規範對促進國家間合作的效力，因為議題的多樣化、議題之間的連結與國家對聲譽的評估並未降低國家不合作的意願，這個現象在非民主國家中相當明顯，特別是較強大的非民主國家。

表面上，維和部隊的紀律不彰雖因貢獻部隊的國家多為發展中國家或非民主國家，而對這些國家來說，財政收入或部門利益才是渠等願意貢獻人力的原因；然而，聯合國對這個議題的不作為侵蝕了典則理論的第一個重點：在部隊紀律管理一事上，聯合國並未設立明確的獎懲機制，降低了國家遵守或違背規範的代價；同時，這個現象也挑戰了聯合國對人道干預及人權價值的尊重與實踐不足。最後，聯合國自1990年代以來對衝突後和平建設類型任務的偏好源於聯合國對民主和平的期待與對民主化的支持，而這些支持反而造成聯合國與地主國之間的資訊失衡，聯合國佈署的任務類型係源於其自身的期待，而非著眼於地主國的需要，這個現象為維和任務的實踐與降低地主國衝突的努力帶來更多的困難與挑戰，同時也引發不少新興強權與區域組織的反對與衝擊。

（收件：107年9月18日，接受：108年4月11日）

The Evaluation of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s and Regime Theory: Reviewing Studies o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Chihwei Y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Security,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Abstract

By reviewing the studies about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contributions and contradictions of those studies and the neo-liberalism arguments abou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tudies. Firstly,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s (PA problems) are not only the most common phenomena in the practice of the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but also are the wide-adapted framework in those studies, particularly on those PA problems that originated from the vague division of labor and from the severe conflict of interests. Secondly, PA problems stemmed from information asymmetry are less studied, even though these problems cause more negative effect on peace duration in the post-conflict society, as well as on the efficacy of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Finally,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ose studies and the reality erodes some arguments from international regime theory. Given the repeat-play interaction, while the neo-liberalists argue the assessment of state's reputation and the existence of issue linkage would influence states to change their values, the non-democratic countries do not adjust their views on operations and their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Further, the lack of reward-punishment mechanism on the disciplines of peacekeepers not only erodes the presumption of regime theory but also implies that the United Nations does not respect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human rights enough. Finally, the expectation on democratic peace and the support of democratization held by the United Nations triggers the information-asymmetry PA problem between the host countrie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which as a result bring mor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for peacekeeping missions.

Keywords: Peacekeeping Operation, Principal-Agent Problems, Regime Theory,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參考文獻

- 李大中，2011，《聯合國維和行動：類型與挑戰》，台北：秀威。Li, Da-zhong. 2011. *Lianheguo weihe hangdong : leixing yu tiaozhan* [The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Categories and its Challenges]. Taipei: Xiuwei Publishing.
- 林文程，2006，〈中共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投票行為分析（1971-2005年）〉，《問題與研究》，45 (3): 1-38。Lin, Wen-Cheng. 2006. “Zhōnggòng zài liánhéguó ānquán lǐshì huì de tóupiào háng wèi fēnxī (1971-2005 nián)” [China’s Voting Behavior in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1971-2005]. *Wenti Yu Yanjiu*, 45 (3): 1-38.
- 林份靜，2009，〈聯合國與建立和平：以獅子山共和國為例〉，《國際關係學報》，27：117-160。Lin, Yi-ching. 2009. “Lianheguo yu jianli heping: yi shizishan gongheguo weili” [UN and Peacebuilding: The Case of Sierra Leone].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7: 117-160.
- 邱坤玄、許志吉，2005，〈美國的國際刑事法庭政策及其對維和行動影響〉，《問題與研究》，44 (6)：29-48。Chiu, Kun-Shuen, Chih-Ji Hsiu. 2005. “Meiguo de guoji xingshi fating zhengce ji qi dui weihe hangdong yingxiang” [American’s Policy towar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Its Influence on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 *Wenti Yu Yanjiu*, 44 (6): 29-48.
- 許志吉，2002，〈中共對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運用否決權的策略分析〉，《東亞季刊》，33 (2): 87-102。Hsiu, Chih-Ji. 2002. “Zhōnggòng dui liánhéguó wéichí héping xíngdòng yùnyòng fǒujué quán de cèlüè fēnxī” [The Analysis of PRC’s Strategy of Casting Veto in the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East Asia Quarterly*, 33(2): 87-102.
- 許志吉，2010，〈中共在聯合國安理會對維和議題的投票行為研究〉，《東亞研究》，41 (2): 75-110。Hsiu, Chih-Ji. 2010. “Zhōnggòng zài liánhéguó ānlǐhuì dui wéihé yìtí de tóupiào háng wèi yánjiū” [China’s Voting Behaviors

of Peacekeeping Issues in UN Security Council]. *East Asia Studies*, 41(2): 75-110.

- 楊永明，1997，〈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之發展：冷戰後國際安全的轉變〉，
《問題與研究》，36 (11)：23-40。Yang, Philip Y. M. 1997. “Lianheguo
weichi heping hangdong zhi fazhan: lengzhan hou guoji anquan de zhuanbian”
[Developments in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enti Yu Yanjiu*, 36 (11): 23-40.
- 鄒念祖，1996，〈聯合國維和行動的未來〉，《美歐月刊》，11 (11)：55-
68。Tzou, Byron N. 1996. Lianheguo weihe han dong de weilai” [The Future
of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merica and Europe Monthly*, 11 (11): 55-
68.
- Abbott, Kenneth W., Robert O. Keohane, Andrew Moravcsik, Anne Marie Slaughter,
and Duncan Snidal. 2000. “The Concept of Legal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4 (3): 401-419.
- Allen, Susan H. 2015. “Estonia: Psychopolitical Dialogue Contributing to Conflict
Prevention.” In McDonald Lund and Steve Michael, eds., *Across the Lines of
Conflict: Facilitating Cooperation to Build Peace*, pp. 53-84.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Allen, Susan Hannah, and Amy T. Yuen. 2014. “The Politics of Peacekeeping: UN
Security Council Oversight Across Peacekeeping Miss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8: 621-632.
- Axelrod, Robert, and Robert O. Keohane. 1993. “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 In David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pp. 85-115.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eardsley, Kyle. 2008. “Agreement without Peace?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and
Time Inconsistency Problem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2 (4) :
723-740.
- Beardsley, Kyle, and Nigel Lo. 2014. “Third-Party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the

Willingness to Make Concess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8 (2): 363-392.

Beber, Bernd, Michael J. Gilligan, Jenny Guardado, and Sabrina Karim. 2017. “Peacekeeping,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Transactional Sex in Monrovia, Liber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1: 1-30.

Bellamy, Alex J., and Charles T. Hunt. 2015. “Twenty first Century UN Peace Operations: Protection, Force and the Changing Security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91 (6): 1277-1298.

Beswick, Danielle. 2010. “Peacekeeping, Regime Security and ‘African Solutions to African Problems’: Exploring motivations for Rwanda’s Involvement in Darfur.” *Third World Quarterly*, 31(5): 739-754.

Bonyongye, Hppyton M. 2000. “Employing Africa Force in Peace Operations in Africa.” In Robert I. Rotberg, Ericka A. Albaugh, Happyton Bonyongye, Christopher Clapham, Jeffrey Herbst, and Steven Metz, eds., *Peacekeeping and Peace Enforcement In Africa*, pp. 84-97. New York, NY: World Peace Foundation Press.

Bove, Vincenzo, and Leandro Elia. 2011. “Supplying Peace: Participation in and Troop Contribution to Peacekeeping Mission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8 (6): 699-714.

Brancati, Dawn, and Jack L. Snyder. 2011. “Rushing to the Polls: The Causes of Premature Postconflict Elect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5 (3): 469-492.

Carr, E. H. 2016.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Chafer, Tony, and Gordon Cummings. 2010. “Beyond Fashoda: Anglo-French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Africa since Saint-Malo.” *International Affairs*, 86(5): 1129-1147.

Chalmers, Malcolm. 2001. “The Atlantic Burden-sharing Debate—Widening or Fragment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77 (3): 569-585.

- Chandler, David. 2017. *PeaceBuilding: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97-2017*.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 Chapman, Terrence L., and Dan Reiter. 2004.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8 (6): 886-909.
- Coleman, Katharina P. 2011. "Innovations in 'African Solutions to African Problems': the Evolving Practice of Regional Peacekeeping in sub-Saharan Africa."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49 (4): 517-545.
- Cunningham, David E. 2006. "Veto Players and Civil War Dur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0 (4): 875-892.
- Curran, David, and Tom Woodhouse. 2007. "Cosmopolitan Peacekeeping and Peacebuilding in Sierra Leone: What Can Africa Contribute?" *International Affairs*, 83 (6): 1055-1070.
- Day, Graham, and Christopher Freeman. 2003. "Policekeeping is the Key: Rebuilding the Inter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of Postwar Iraq." *International Affairs*, 79 (2): 299-313.
- Diehl, Paul F. 2016. "Breaking the Conflict Trap: The Impact of Peacekeeping on Violence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Post-Conflict Context." In David Mason and Sara McLaughlin Mitchell T., eds., *What Do We Know about Civil Wars?*, pp. 139-156. New York, NY: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ress.
- Doyle, Michael, and Nicholas Sambanis. 2007.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In Thomas G. Weiss and Sam Daw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n the United Nations*, pp. 324-334.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avretto, Katja. 2009. "Should Peacemakers Take Sides? Major Power Mediation, Coercion, and Bia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3 (2): 248-263.
- Foot, Rosemary. 2014. "'Doing Some Things' in the Xi Jinping Era: the United Nations as China's Venue of Choi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90 (5): 1085-1100.
- Fortna, Virginia Page. 2003. "Scraps of Paper? Agreements and the Durability of Pea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7: 337-372.

- Fortna, Virginia Page. 2008. "Peacekeeping and Democratization." In Anna K. Jarstad and Timothy D. Sisk, eds., *From War to Peace: Dilemmas of Peacebuilding*, pp. 39-79.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rederking, Brian. 2007.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ecurity Council: Collective Security since the Cold War*. New York, NY: Routledge Press.
- Fruchart, Damien, Paul Holtom, Siemon T. Wezeman, Daniel Strandow, and Peter Wallensteen. 2007. *United Nations Arms Embargoes: Their Impact on Arms Flows and Target Behavior*. Uppsala, Sweden: SIPRI and Uppsala University.
- Gaibullov, Khusrav, Justin George, Todd Sandler, and Hirofumi Shimizu. 2015. "Personnel Contributions to UN and Non-UN Peacekeeping Missions: A Public Goods Approach."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2 (6): 727-742.
- Gökalp, Deniz. 2017. "Regime Change: Neo-Liberal State-Building and Its Collapse on Iraqi Society." In Abu Bakarr Bah, 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Peacebuilding: Africa, the Middle East, and Europe*, pp. 170-198.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Hawkins, Darren G., David A. Lake, Daniel L. Nielson, and Michael J. Tierney. 2006. *Delegation and Agency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Chin-Hao. 2011. "Principles and Praxis of China's Peacekeeping."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18 (3): 257-270.
- Hultman, Lisa, and Dursun Peksen. 2017. "Successful or Counterproductive Coercion? 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on Conflict Intensit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1(6): 1315-1339.
- Ikenberry, John, and Charles A. Kupchan. 1990. "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4 (3): 283-315.
- International Peace Academy. 1984. *The Peacekeeper's Handbook*. New York, NY: Pergamon Press.
- Ishizuka, Matsumi. 2013. "The Crisis Management Capability of Japan's Self Defense Forces for UN Peacekeeping, Counter-Terrorism, and Disaster Relief."

-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4 (2): 201-222.
- Jahn, Beate. 2009. "The Tragedy of Liberal Diplomacy." In David Chandler, ed., *Statebuilding and Intervention: Policies, Practices and Paradigms*, pp. 210-229. New York, NY: Routledge Press.
- Jarstad, Anna K. 2008. "Dilemmas of War-to Democracy Transition: Theories and Concepts." In Anna K. Jarstad and Timothy D. Sisk, eds., *From War to Democracy: Dilemmas of Peacebuilding*, pp. 17-36.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arstad, Anna. 2016. "Democratization After Civil War." In Brown Langer and Graham K. Arnim, eds., *Building Sustainable Peace: Timing and Sequencing of 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 and Peacebuilding*, pp. 87-109.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ssim, Yang Razali. 2014. *The Geopolitics of Intervention: Asia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New York, NY: Springer Press.
- Katayanagi, Mari. 2002. *Human Rights Functions of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Hague, Netherland: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Press.
- Kathman, Jacob D., and Molly M. Melin. 2017. "Who Keeps the Peace? Understanding State Contributions to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61: 150-162.
- Kelmendi, Pellumb, and Andrew Radin. 2016. "UN Satisfied? Public Support for Postconflict International Miss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2(5): 1-29.
- Kim, Sang Ki. 2017.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in Civil Wars and the Prospects for Postwar Developmen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1 (3): 615-642.
- Kirby, Paul, and Laura J. Shepherd. 2016. "The Futures Past of the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Agenda." *International Affairs*, 92 (2): 373-392.
- Klotz, Audie. 1996. "Norms and Sanctions: Lessons from the Socialization of South Afric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2 (2): 173-190.
- Komai, Makereta. 2015. "Fiji'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New Pacific Diplomacy."

In Greg Fry and Sandra Tarte, eds., *The New Pacific Diplomacy*, pp. 111-122. Sydney, Australia: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Krasner, Stephen D. 1983.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pp. 1-21. Ithaca,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reps, Sarah, and Sarah Maxey. 2017. "Mechanisms of Morality Sources of Support for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2 (8): 1814-1842.

Kydd, Andrew. 2004. "Trust Building, Trust Breaking: The Dilemma of NATO Enlargement." In Barbara Koremenos Lipson and Duncan Snidal Charles, eds., *The Rational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pp.41-68.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ydd, Andrew H. 2006. "When Can Mediators Build Trus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0 (3): 449-462.

Lebovic, James H. 2004. "Uniting for Peace? Democracies and United Nations Peace Opera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8 (6): 910-936.

Lund, Michael. 2015. "Intrastate Conflicts and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Will." In McDonald Lund and Steve Michael, eds., *Across the Lines of Conflict: Facilitating Cooperation to Build Peace*, pp. 3-22.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ader, Matthias. 2017. "Citizens' Perceptions of Policy Objectives and Support for Military Action: Looking for Prudence in German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1 (6): 1290-1314.

Mansbach, Richard W., and Edward Rhodes. 2009. *Global Politics in a Changing World*.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Press.

Martin, Lisa L., and Beth A. Simmons. 1998. "Theories and Empirical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 (4): 729-757.

Mattes, Michaela, and Burcu Savun. 2010. "Information, Agreement Design, and the

- Durability of Civil War Settlem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4 (2): 511-524.
- Melvorn, Linda. 2001. “The Security Council: Behind the Scen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77(1): 101-111.
- Mironova, Vera, and Sam Whitt. 2017.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and Positive Peace: Evidence from Kosovo.”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1 (10): 2074-2104.
- Newman, Edward. 2015.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Multilat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In Ramesh Thakur and William Maley, eds., *Theorising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pp. 125-143.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kiwane, Tandeka. 2001. “Peacekeeping in Africa: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Af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 (2): 97-108.
- Oestreich, Joel E. 2007. *Power and Principle: Human Rights Programming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Oppenheimer, Joe. 2012. *Principles of Politics: A Rational Choice Theory Guide to Politics and Social Justice*.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ris, Roland. 2004. *At War's End: Building Peace after Civil Conflict*.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ris, Roland. 2014. “Are Canadians Still Liberal Internationalists? Foreign Policy and Public Opinion in the Harper Era.” *International Journal: Canada's Journal of Global Policy Analysis*, 69 (3): 274-307.
- Poku, Nana K., Neil Renwick, and Joao Gomes Porto. 2007. “Human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International Affairs*, 83 (6): 1155-1170.
- Regan, Patrick M. 2002. “Third-Party Interventions and the Duration of Intrastate Conflic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6 (1): 55-73.
- Reifler, Jason, Thomas J. Scotto and Harold Clarke. 2011.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Structure and Releva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5 (1): 245-266.

- Richmond, Oliver P. 2004. "UN Peace Operations and the Dilemmas of the Peacebuilding Consensus."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11 (1): 83-101.
- Roper, Steven D., and Lilian A. Barria. 2010. "Burden Sharing in the Funding of the UNHCR: Refugee Protection as an Impure Public Good."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4 (4): 616-637.
- Ruggeri, Andrea, Han Dorussen, and Theodora-Ismene Gizelis. 2017. "Winning the Peace Locally UN Peacekeeping and Local Conflic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1 (1): 163-185.
- Ruggeri, Andrea, Theodora-Ismene Gizelis, and Han Dorussen. 2013. "Managing Mistrust: An Analysis of Cooperation with UN Peacekeeping in Africa."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7 (3): 387-409.
- Sandler, Todd. 2017.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Burden Sharing and 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1 (9): 1875-1897.
- Schörnig, Niklas, and Alexander C. Lembcke. 2006. "The Vision of War without Casualties. On the Use of Casualty Aversion in Armament Advertisemen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0 (2): 204-227.
- Scott, Shirley V. 2015. "Implications of Climate Change for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Mapping the Range of Potential Policy Respons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91 (5): 1317-1333.
- Sikkink, Kathryn. 2017. *Evidence for Hope: Making Human Rights Work in the 21st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Adam C. 2013.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Alex J. Bellamy and Paul D. Williams, eds., *Providing Peacekeepers: The Politics, Challenges, and Future of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Contributions*, pp. 71-92.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ähle, Stefan. 2008. "China's Shifting Attitude Towards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195: 631-655.
- Steinberg, Richard. 2010. "Principal-Agent Theory and Nonprofit Accountability." In J. Hopt and Thomas Von Hippel Klaus, eds., *Comparative Corporate*

- Governance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pp. 73-125.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erling-Folker, Jennifer. 2002.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Primacy of Anarchy: Explaining U.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Making After Bretton Wood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Sussex, Matthew, and Roger E. Kanet. 2015. "Conclusion." In Roger E. Kanet and Matthew Sussex, eds., *Russia, Eurasia and the New Geopolitics of Energy: Confrontation and Consolidation*, pp. 234-242.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 Thiessen, Charles. 2011. "Emancipatory Peacebuilding: Critical Responses to (Neo) Liberal Trends." In Thomas Matyók, Jessica Senehi and Sean Byrne, eds., *Critical Issues in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Theory, Practice and Pedagogy*, pp. 115-140. Lanham, MD: Lexington Press.
- Tomz, Michael. 2007.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overeign Debt across Three Centur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United Nations. 1992. "An Agenda for Peace: Preventive Diplomacy, Peacemaking and Peacekeeping."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1478328/files/DPI_1247-EN.pdf (June 10, 2018).
- United Nations. 2000. "Report of the Panel on United Nations Peace Operations." <https://www.un.org/documents/ga/docs/55/a55305.pdf> (June 10, 2018).
- United Nations. 2018a. "Conduct in UN Field Missions: Professionalism, Efficiency, Integrity and Dignity-Other Misconduct." <https://conduct.unmissions.org/other-misconduct-introduction> (September 4, 2018).
- United Nations. 2018b. "Conduct in UN Field Missions: Professionalism, Efficiency, Integrity and Dignity-Other Misconduct: Data." <https://conduct.unmissions.org/other-misconduct-data> (September 4, 2018).
- United Nations. 2018c. "Conduct in UN Field Missions: Professionalism, Efficiency, Integrity and Dignity-Sexual Exploitation and Abuse." <https://conduct.unmissions.org/table-of-allegations> (September 4, 2018).

- Uitley, Rachel E. 2006. "A Mean to Wilder End ? France, Germany and Peacekeeping." In E. UitleyRachel, ed., *Major Powers and Peacekeeping: Perspectives, Priorities and the Challenges*, pp. 63-80. Burlington, VT: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Press.
- Victor, Jonah. 2010. "African Peacekeeping in Africa: Warlord Politics, Defense Economics, and State Legitimacy."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7 (2): 217-229.
- Vines, Alex. 2013. "A Decade of African Peace and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ternational Affairs*, 89 (1): 89-109.
- Waal, Alex de. 2007. "Darfur and the Failure of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International Affairs*, 83 (6): 1039-1054.
- Waal, Alex de. 2009. "Mission without End? Peacekeeping in the African Political Marketpla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85 (1): 99-113.
- Wall, James A., and Jr. Daniel Druckman. 2003. "Mediation in Peacekeeping Miss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7 (5): 693-705.
- Walter, Barbara F. 2015. "Why Bad Governance Leads to Repeat Civil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9 (7): 1242-1272.
- Ward, Huge, and Han Dorussen. 2016. "Standing alongside Your Friends: Network Centrality and Providing Troops to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3 (3): 392-408.
- Williams, Paul D. 2014. "After Westgat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War against Al-Shabaab." *International Affairs*, 90 (4): 907-923.
- Wood, Pia Christina, and David S. Sorenson. 2005. "Introduction." In David S. Sorenson and Pia Christina Wood, eds., *The Politics of Peacekeeping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pp. 1-8. New York, NY: Routledge Press.
- Wood, Reed M., Jacob D. Kathman, and Stephen Gent. 2012. "Armed Intervention and Civilian Victimization in Intrastate Conflic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9(5): 647-660.
- Yamashita, Hikaru. 2012. "Peacekeeping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Regional Organis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8 (1): 165-186.

Zhao, Lei. 2012. “Two Pillars of China’s Global Peace Engagement Strategy: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eacebuilding.” In Hirono Lanteigne and Miwa Marc, eds., *China’s Evolving Approach to Peacekeeping*, pp. 102-120. New York, NY: Routledge Press.

Zürcher, Christoph, Carrie Manning, Kristie D. Evenson, Rachel Hayman, Sarah Riese, and Nora Roehner. 2013. *Costly Democracy: Peacebuilding and Democratization after W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